

关于性工作者的瑞典模式的真正影响

#3

瑞典模式关于服务提供的理论支持带来的影响

瑞典模式关于服务提供的理论支持带来的影响

介绍

在本工具包第二份文献中，我们讨论了瑞典模式（对买性刑事定罪）的直接影响：该法律最明显的结果是对性工作者的伤害，尤其是街头性工作者，另外，除了这些负面影响外，该法律也没有实现减少瑞典各层次性工作规模的野心。

在本文献中，我要讨论那些买性法律的理论依据所带来的影响，那些理论我们在本工具包的第一份文献中有所阐述。具体来说，这些由废娼激进女权主义者倡导的理念包括：性工作的建构是一种暴力形式；暴力与性工作之间有着永久的不可改变的联系；性工作者都是被动的没有得到赋权的受害者。本文关注的是这些理念和概括结论对公立的面向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减低伤害服务机构所产生的营销，以及围绕减低伤害的一些观点。

什么是减低伤害？为什么需要减低伤害？

和其他工作一样，性工作也可能产生伤害。如果法律制度对性工作者刑事定罪，那么这些伤害就会恶化，因为这会将性工作者边缘化，加剧社会排斥，将性工作赶入地下的隐蔽场所（如工具包中第二份文献所述）；刑事定罪导致性工作与服务机构和公立保护机制脱离。暴力、污名和歧视都是与一些性工作相联系的主要伤害，其他伤害还有艾滋病毒和其他性病和血液传播的感染。

这些伤害是多样的，而且，和其他可能与职业或职业场所相关的所有伤害与难题一样，这些伤害是可以得到处理、缓解和降低的。尽管瑞典公开的野心是废除性工作，O'Connell Davidson (2003)¹ 针对性地指出，即

使目标仅是减小性工作的规模，也应当同时重视降低性工作相关的伤害（必须强调，废娼和刑事定罪，直接或间接地加重甚至制造伤害，正如第二份文献所述。）

减低伤害倡议将其本身置于政治中立的位置：他们并不要求减少行为的规模，而是转为减低可能与行为相联系伤害。减低伤害首先在抗击艾滋病工作中的毒品使用者问题上得到倡导和应用，之后用于性工作者倡导；包括提供安全套和润滑剂、提供性交易时的安全信息、医疗和GUM（泌尿生殖系统药物）、争议性的非刑罪化（因刑事定罪本身就意味着伤害）。为降低性工作可能相关的伤害，减低伤害工作势在必行，无论是否像瑞典一样有缩小性工作规模的政治野心。

如果减低伤害势在必行，有反对意见吗？

是的：废娼主义的女权理论将性工作视为一种暴力形式，与性工作相联系的各种暴力是永远不变的。这意味着减低伤害被直接排除考虑了，因为：

- 1 减低伤害并没有致力于减小性工作的规模，这就是与废娼目标冲突；
- 2 废娼理论认为性工作相联系伤害是不可被减低的，因此努力减低伤害的努力是无意义且不现实的。如下面引文所述那样，认为性工作永远不可避免第“非常非常危险”：

“卖淫本身就吸引怪人，我认为卖淫一直是，并将永远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能怎么帮助人们，你能提供什么信息来帮助人们？”

（访谈，2009，社工，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²

如果法律制度对性工作者刑事定罪，那么这些伤害就会恶化，因为这会将性工作者边缘化，加剧社会排斥，将性工作赶入地下的隐蔽场所

1 O'Connell Davidson, J., 2003,《“与敌人同眠？”废娼女权主义关于惩罚买性者的呼吁存在的问题》，社会政策与社会2,1: 55-63

2 Levy, J., 2014,《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Abingdon: Routledge)

他们不认为安全套是促进健康和减低伤害的方式，而是吸引性工作者来斯德哥尔摩工作组办公室的手段

正如激进女权的其他论调一样，这种对减低伤害的反对言论也影响了瑞典相关部门和服务机构。为性工作者减低伤害受到了反对，既然大家都认为伤害不可避免，那减低有什么意义呢，反而是鼓励和促进了性工作。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减低伤害，从业者就会收手。减低伤害的工作被视为不利于瑞典公开的废娼目标。

“减低伤害在很多时候，我认为是让人们留在困境中，而不是帮他们离开。”

(访谈，2009，社工，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³

关于向性工作者及其客户提供安全套的瑞典观点

对减低伤害的广泛反对导致了相关服务机构（瑞典娼妓工作组）的反对立场。政府要求这些组织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来减小性工作规模。⁴尽管性工作者及其客人都是瑞典国家健康福利理事会关于艾滋病与性病预防工作的重点，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在外展工作中却反对向性工作提供安全套。他们不认为安全套是促进健康和减低伤害的方式，而是吸引性工作者来斯德哥尔摩工作组办公室的手段（领安全套）。

尽管瑞典经常被视为全世界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瑞典模式却导致街头性工作者得不到安全套。性工作者不得不彼此间相互提供安全套，更有报告显示性工作者不得不去偷安全套，这些都证明了街头性工作者需要通过外展工作获得安全套：

“每次我到街上，女孩们就过来跟我要安全套……我之前工作时，一般都是在街头……女孩们偷安全套用。现在我不知道她们怎么办。曾经有个上的，后来他们不想让我们进去了。”

(访谈，2009，性工作者[街头，伴游，网络])⁵

不仅是反对向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瑞典也考虑反对为性工作者的客户提供安全套。马尔默娼妓工作组曾经试图提供减低伤害服务，在外展中为性工作者及其客人提供安全套。然而，向客人提供安全套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

乙：“我们试过安全套，结果成了个全国性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是全国的。你要是想想，就觉得这非常可笑，‘因为你记得不，我们一共发了几个安全套？’”

甲：“八个安全套。”

乙：“八个安全套！八个安全套，就成了全国大问题。”

(访谈，2010，两个社工，马尔默娼妓工作组)⁶

这种反对立场完全要归咎于瑞典的实际情况和废娼主义女权者的理论，性交易被建构为一种暴力形式；这种理论就是瑞典模式的依据。既然性工作是一种暴力，为性工作者的客人提供安全套就是暴力的帮凶，就是为暴力行为提供工具，而不是促进健康和减低伤害。

3 Levy, J., 2014,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4 一定要记住，瑞典希望通过法律干预和社会干预来缩小性工作的规模。尽管如此，当法律在1999年实施时，对相关社会服务没有任何投入（倒是有几百万瑞典克朗投入了警方）。

5 Levy, J., 2014,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6 Levy, J., 2014,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如果认为性工作是不可避免地永远与暴力共存，则安全性工作信息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不存在什么安全性工作。

关于安全性行为指导和减低伤害信息的瑞典观点

不仅向性工作及其客人提供安全套，马尔默工作组也提供减低伤害包，里面有由性工作自己做的安全性工作指导手册。然而，这份指导再次被一些人认为是在鼓励性工作，甚至被国家反贩卖人口和卖淫协调员认为是鼓励人进入性工作：

“也许有些还没有在卖淫业的年轻女孩，她们在网上看到这个，会想‘嘿，我有了这本手册，就可以安全，还有其他这些材料，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访谈，2009，斯德哥尔摩)⁷

综上所述，如果认为性工作是不可避免地永远与暴力共存，则安全性工作信息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不存在什么安全性工作。

更糟的是，一个推动瑞典模式的瑞典政客表示，既然买性被刑事定罪了，那么提供减低伤害和性工作相关信息，就是为如何犯罪提供信息，这种犯罪是被主流瑞典观念认定的暴力。

“既然它是非法的，你就不能，如果你要在瑞典提供非法事务的信息，就非常奇怪了。”

(访谈，2010，买性法律提案人；政客—社会民主)⁸

由于减低伤害和安全性工作信息提供得如此之少，瑞典性工作者要避免伤害，就只能自己寻找信息，或彼此教导，以及“吃一堑长一智”。

在瑞典为性工作提供有限的有条件的服务

除了瑞典对减低伤害的反对立场，将性工作的片面概括为可疑且充满暴力，也影响了瑞典服务机构的态度和观念。如果把所有的性工作都当做需要援助其离开性工作的受害者，服务机构就不关心那些不反对性工作或不自认为受害者的性工作。这些性工作不符合主流政治对性工作的假设，就被排除在国家支持的援助之外。因为，“自我感觉良好”的性工作被认为不值得浪费服务机构的力量。

“既然他们感觉挺好，愿意待着，那我也没问题。我的意思是，哪天他们不想继续了，他们就可以来找我。我不为那群人费劲儿。”

(访谈，2009，斯德哥尔摩)⁹

尽管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的受访者强调他们不评判来访者，而且他们也不坚持要求来访者停止性交易，但他们认同的瑞典关于性工作的理念会使他们将来访者当做受害者，并在提供服务时采用废娼主义的条件。

7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8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9 Levy, J., 2014. 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只有那些认为性工作有问题的性工作者才符合服务机构的标准。那些不把自己当受害者或不质疑性工作的，或者根本不寻找服务的，都得不到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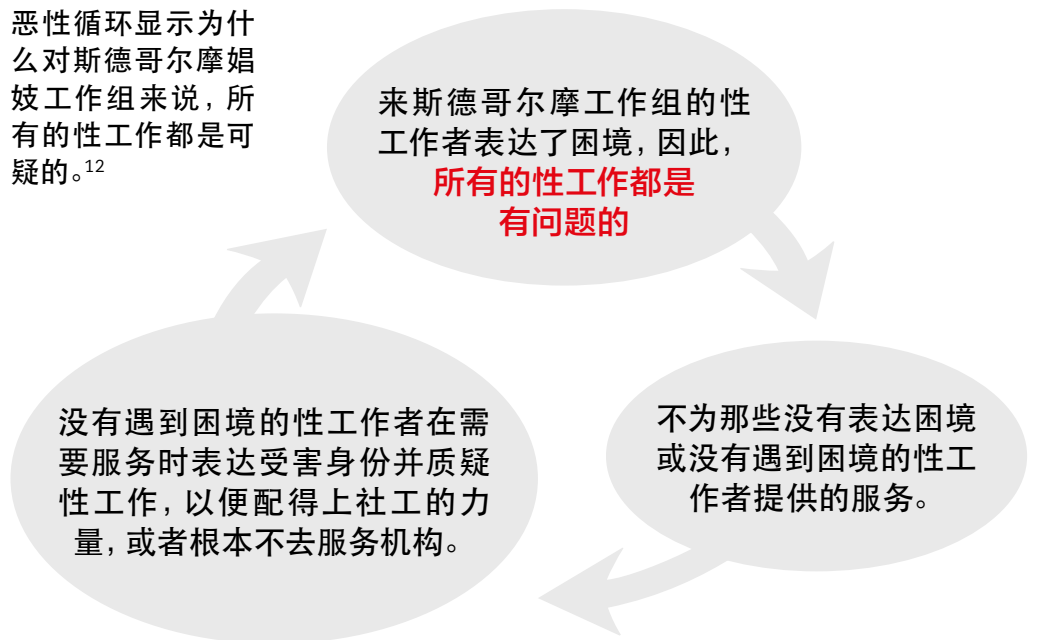
正如下文引文所述，一名性工作者指出社工拒绝帮助她拿到医生的通知，除非她停止一段时间的性工作；另一名性工作表示，她在和工作组的社工打交道时，需要接受受害者的身份。这些话很明显与斯德哥尔摩工作中的中立声明有矛盾，意味着服务机构完全接受了瑞典模式的理论依据。

“我去找他们找了好几个月，她（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社工）告诉我，如果她要帮我获得我需要的病假条……她可以帮我写个文件，去找医生要病假条，因为我已经等了三年了……她说‘如果你停止卖淫三个月，三个月什么也不做，我就帮你写这个文件’”。（访谈，2009，性工作者[街头；伴游；网络]）¹⁰

“我有很多疑问。这是错的吗？如果我病了怎么办？我被抢了怎么办？我被客人杀了怎么办？……他们从不说好的，只是让事情更糟。所以，当我从他们那里回家时，一直在哭，感觉‘天呐，我是个多么肮脏的人’……我喜欢做这个，我不是坏女孩……他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以及我们为什么存在。而不是把我们推回街上，说‘你是个坏人’”。（访谈，2010，性工作者[网络；伴游]）¹¹

通过仅有的少量符合政府支持援助的标准的性工作者，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瑞典各方认为所有的性工作都是有问题的：只有那些认为性工作有问题的性工作者才符合服务机构的标准。那些不把自己当受害者或不质疑性工作的，或者根本不寻找服务的，都得不到援助：

恶性循环显示为什么对斯德哥尔摩娼妓工作组来说，所有的性工作都是可疑的。¹²



10 Levy, J., 2014,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11 Levy, J., 2014,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 (Abingdon: Routledge)
12 Levy, J., 2012,《瑞典的二等公民：性工作与毒品使用者在人民之家》(剑桥大学：博士论文)



小结

在反对瑞典模式时，观点经常倾向于专注于法律的直接后果。这篇文章清晰地表明，需要反对的不仅是法律本身，还要反对法律背后的理念，法律依据来源的意识形态。

这些理念包括将性工作片面概况为不可避免的暴力，以及认定性工作者是被剥夺权利的受害者，而这些理念直接塑造了服务机构的观点。减低伤害倡议被反对，就因为被视为无意义且有害，因为他们显然是在鼓励帮助性工作。这种由瑞典激进废娼女权主义驱动的反，与对毒品相关的减低伤害的反对很相似。针具交换和发放都被错误地认为是在鼓励吸毒，而不从减低伤害角度来看待。

瑞典模式被当做先进的法律和理念而得到倡导，它被当做瑞典自由先进公共福利的一部分，体现了瑞典走向性别平等的渴望。尽管如此，根据瑞典模式的理论依据，而拒绝为性工作者提供基本服务和减低伤害，并不利于实现这些目标。

这种由瑞典激进废娼女权主义驱动的反，与对毒品相关的减低伤害的反对很相似。针具交换和发放都被错误地认为是在鼓励吸毒，而不从减低伤害角度来看待。

更多相关资料

本工具包的四篇文献来自于作者 Jay Levy 博士于2008-2012年在瑞典的研究。完整研究参见：

- Levy, J., 2014,《对买性刑事定罪——瑞典教训》(Abingdon: Routledge)

除这本书外，一些重要文献可供参考。

关于减低伤害，尤其是性工作相关的内容，以及专注减低伤害和提供服务的重要性，参见：

- Cusick, L., 2005, 《扩展减低伤害工作：从毒品使用到性工作》，国际毒品政策期刊, 17: 3-11
- Rekart, M. L., 2005,《关于性工作的减低伤害》，柳叶刀, 366: 2123-2134

更多关于瑞典模式对服务提供的影响的讨论，参见：

- Levy, J. and Jakobsson, P., 2014, 《瑞典的废娼论与法律：对瑞典性工作动力和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响》，犯罪学与刑法, doi: 10.1177/1748895814528926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

NSWP is a private not-for-profit limited company.
Company No. SC349355

BRIDGING THE GAPS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